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 连接、信任与认同

INTERCULTURAL VIRTUAL COMMUNITY :
CONNECTION ,TRUST AND IDENTITY

肖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跨文化传播研究丛书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 连接、信任与认同

INTERCULTURAL VIRTUAL COMMUNITY :
CONNECTION ,TRUST AND IDENTITY

肖 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 / 肖珺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

(跨文化传播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0035 - 9

I . ①跨… II . ①肖… III. ①文化传播 - 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495 号

· 跨文化传播研究丛书 ·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

著者 / 肖 琯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刘 娟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3.25 字 数：204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035 - 9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跨文化传播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 单 波

编 委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 (Clifford Christians)

于格·欧梯也 (Hugues Hotier)

延斯·奥尔伍德 (Jans Allwood)

纪 莉

韩友耿 (Juergen Henze)

李少南

石义彬

孙有中

肖 琨

周树华

周 翔

总 序

全球化越发展，我们就越是怀着乡愁走向远方，在陌生人社会里遭遇“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之惑。

人的自由天性总是使人突破地域性的交流，即便深知交流是没有保障的冒险，尝尽思乡怀亲的痛苦，也要为拓展自由交流空间而不顾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讲，自由天性成就了人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人因为多元文化与多元交流而具有了通向自由的可能性。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交流史的历史性转折，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普遍发展带来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并把人们推到了一种可能的历史场景之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有助于开放自我、开放社会，从而更好地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当然，这是被资本控制的普遍交往，资本使得社会交换成为互动的普遍形式，并进一步加速社会流动和分化，以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名义界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以“科学”的种族主义名义界定种族支配权力关系，以理性主义的名义界定社会分层，制造符合资本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社会流动性增强，另一方面是种族之间、民族之间、群体之间、阶级之间的冲突频繁爆发，如何把人从交流的困境中救出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问题。^①

跨文化传播作为一个过程，它使人们从文化转向跨文化，一路与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话语理论、文化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相互激荡，有时也与全球化同行。

跨文化传播问题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被西方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营销学家等各路学

^①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30页。

者捕捉到，并形成了漫长的思想之流。^①这一思想之流隐含了特定的西方跨文化传播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霍尔”（Hall）的问题：好心的爱德华·霍尔试图帮助美国人克服傲慢与偏见，改善与其他文化群体的交流，但这种努力不仅改变不了美国霸权的实质及其灾难性的后果，相反被收编到美国全球化战略之中，以致霍尔当年的培训方法被扩展到各种商业培训，使美国人更懂得如何玩弄全球化的游戏。斯图尔特·霍尔力求指点强权范围之内和之间的缝隙，呈现文化抗争的希望，同时也通过建构去中心化的主体性，使人类能生活在互动与对话之中。可是，被全球化抛弃、压迫的人们常常是本能地选择冲突、暴力，把排斥他者作为抗拒全球化的方式，或者在文化自恋中独自疗伤，走向自我封闭；而英国政治家们则不断地以不同形式呼吁民族团结，暗中寻求办法来消除和抵制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出现。到头来，理论依然被大众与政治家的喧嚣无情地淹没。

长期以来，我们活在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阴影里，导入其理论与方法，可最终发现那是西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产物，难以应对我们的问题。那么，中国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是什么呢？

中国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扩大了文化冲突，中国如何与他者交流，如何理解他者又如何被他者所理解，如何与他者进行价值观对话，如何与他者建立信任关系，如何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这些都成了极为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面临更多的跨文化传播问题：发展不平衡的民族如何化解冲突，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新生代农民等弱势群体的“交流贫困”，如何重建群体间的信任关系，如何面对媒介化社会的“失联”现象，如何在陌生人社会里重建人的交流关系。

在跨文化传播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有着相似性：无论崇尚自由、信奉占卜的罗姆人，还是怀着乡愁为寻找富裕之路而散落四方的中国农村人，每个拥有不同信条的群体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被共同赋予同一个信条——财富。当财富分配不均，每个群体都会用自己的文化方式表示着抗议。中国有着跨文化的特殊性，更多地偏向以文“化”人的

^① 参见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第二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同化策略，失落了“和实生物”的智慧。而这种智慧的失落使多元文化群体的交流失去了内在的支撑。

这套丛书试图集中探索基于中国问题的跨文化传播，其特点在于：聚焦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问题，并把这种问题还原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加以观察，呈现中国人的跨文化交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路径，建构中国人的跨文化传播视野。

为此，我们努力面向问题而思，面对交流而辨。

是为序。

单 波

2015年秋於珞珈山

序

在这个网上冲浪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交流一点一滴地被“0”与“1”的数字化洪流裹挟而去，不由自主地在虚拟空间中穿越。假如我们摆脱了互联网眩晕症，适应了这种生活，就能看到一幅全新的全球化景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带入虚拟空间之中，并由此构建成一个个虚拟文化共同体，使得素未谋面的网民，在共同体中实现情感的共鸣与意义的分享，进而在特定的时刻转化为现实行动。与此同时，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冲突与调适，也在虚拟共同体中持续上演。新问题出现了：多元文化身份的人如何组成了虚拟共同体？虚拟共同体是否能够促进文化对话，进而消解现实中的跨文化冲突？这是能勾起每一个人兴趣的时代命题。

读者诸君手中的这本著作，正是围绕上述核心问题做出的开创性探索。作者首先通过理论梳理，界定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概念，并由此导出连接、信任与认同三个核心议题；然后选取少数民族原住民、多民族学习共同体和离散华裔人士三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围绕每个核心议题进行经验研究，最终又归结到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理论思考之上，形成理论与经验的统一。

本书选取的三个案例都饶有趣味。数字原住民和虚拟共同体的信任问题，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加以关注，但是从族群文化身份切入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作者聚焦少数民族这一容易被新媒体研究者忽视的群体，分析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网络连接行为中表现出的文化身份特质，以及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在虚拟团队共同学习中的跨文化问题。作者通过两个案例研究，提醒我们在思考民众运用新媒介时，使用者的文化身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唐君毅先生曾感喟在西方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之下，中华文化面临“花

果凋零”的悲情处境，散居各地的华人唯有“灵根自植”，方能坚守自身的文化主体，并与其他文明展开对话。传播技术的发达，使得文化共同体的范畴远远超越了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离散海外的华人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寻找自己的文化根系，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并使得自己作为华裔的文化身份得以绵延，而这种虚拟文化共同体的运作机制，只有在各方矛盾凸显的新媒体事件中才能得到清晰的表露。本书选取的正是海外华人新媒体社会运动中文化身份焦虑与困惑的焦点时刻，运用曼纽尔·卡斯特的三种认同理论，对于全球华人在这起事件中的反应行动进行了沉浸式的观察，揭示了虚拟文化共同体中身份认同的流动与混杂，以及三类认同间的幽微关联。

虚拟共同体存在于赛博空间之中，研究者无法像研究传统共同体一样进入。稍纵即逝的研究时机、匿名且自发的群体特质、变动不拘的信息流、庞大芜杂的文本量，都给相关的研究带来了棘手的挑战，而研究对象所共有的“跨文化”特征，也给研究者的“入场”平添了难度。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回避这些困难，而是综合运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文本分析、浸入式观察等多种研究方法，敏锐地追踪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动态变化，兼顾线上行动与线下行动的关系脉络，结合质化与量化的视角对其运作机制展开研究，正是通过这样扎实的经验性考察切入核心问题。

作者以连接、信任与认同三个维度为支柱，搭建起解读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分析框架，做出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探索。三个维度是建立跨文化虚拟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然而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各自独立还是交叉影响？是逐层递进还是回环往复？进一步思考，除了上述三个维度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解读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重要视角被遮蔽？三个案例呈现的跨文化冲突以及身份困境各不相同，在构建连接、信任与认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就给更高层次的理论观照增加了难度，即如何建立起更为圆融的统摄性分析框架，同时对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理论层次进行更加细致的勾勒与分析。

媒介既是文化交流之桥，又是文化隔阂之沟，媒介技术的发展，不断延伸着人际沟通的触角，同时也制造出新的偏倚与断裂。这些影响内嵌在媒介的技术特性之中，更植根于媒介与人的关系之中。正是基于新媒介跨越时空

的传播能力，虚拟共同体的紧密连接才成为可能，因此虚拟共同体中的信任与认同，也与新媒介的特质融为一体，成为媒介化的连接、信任与认同。那么虚拟共同体的文化特质，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媒介特质的影响？由此而建立起的信任与认同，带有怎样的媒介化烙印？这样的媒介化特质，究竟是解放还是阻碍了人们的跨文化交流？作者在书中曾多次触及这些问题，并在全书结尾处论及技术与共同体建构的关联。如何由此展开深入细致的观察？这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筚路蓝缕，其行维艰。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研究都刚刚起步，尚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思考，虚拟民族志等新兴研究方法也未臻成熟，留有广阔的开拓空间。多年来，我和作者共同走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道路上，探寻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作者独辟蹊径，专注于互联网时代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沉潜其中，深造而自得之。我相信她通过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研究，会不断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新问题与新方法，拓展理论想象空间，寻觅通向文化间自由交流的新路径。

是为序。

单波

丙申年寒露于珞珈山

目 录

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中的虚拟共同体	001
一 虚拟共同体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主体与路径	001
二 虚拟共同体的形成	004
三 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	006
四 离散族裔虚拟共同体	012
五 本书脉络与概要	014
第二章 虚拟共同体的连接、信任与认同	016
一 基于连接的虚拟共同体	016
二 虚拟共同体的信任形成与维系	018
三 虚拟共同体中的认同建构	020
第三章 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数字化连接	028
一 数字原住民的网络连接	029
二 少数民族数字原住民的连接行为	032
三 连接与公民社会的讨论缺席	053
第四章 跨文化虚拟学习共同体的信任	075
一 虚拟学习共同体的形成与成员参与	076
二 跨文化虚拟学习团队的信任形成与维系	086
三 信任、互动及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效果间的联系	097

第五章 离散族裔的跨文化身份认同	104
一 美国华人共同体及其身份认同的变迁	104
二 新媒体社会运动中的认同建构：合法、抗拒与规划	118
三 离散华人的跨文化身份认同建构	129
第六章 跨文化虚拟共同体的维度及关系	168
一 连接与信任	168
二 认同	170
三 技术与共同体	172
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91

第一章

跨文化传播中的虚拟共同体

一 虚拟共同体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主体与路径

共同体（gemeinschaft，英译做 community）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明确定义，他认为，共同体是“拥有共同事物的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感觉的群体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积淀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和习惯，或思想的共同记忆，是人们对某种共同关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更具有意义的一种平等互助关系”。滕尼斯将“共同体”从“社会”（gesellschaft）的概念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共同体’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词语，它与‘社会’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Tönnies, 1999: iii）

滕尼斯所强调的共同体是在血缘、感情和伦理基础上的自然成长，他认为其基本形式包括亲戚（血缘共同体）、邻里（地缘共同体）、友谊（精神共同体）。而共同体中的个体有着相同的目标，追求和谐的生活方式和“善”。因此，这种生活方式使得共同体中的个体紧密联系，守望相助，共生排他。在此意义上的共同体，在地方中形成，离不开地缘和“在场”。

不过，全球化和信息化改变了共同体对地方的依赖，以及地方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新的通信手段为构筑和奠定归属感开启了可供选择的道路，共同体产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发展为穿越时空的社会关系网络，使

遥远的事件和力量渗透到我们当地的经历中。新的通信技术和信息环境酝酿着新的流动形态和互动方式，卡斯特认为当代社会是围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流动成为所有事物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最终宿命。资本流动、信息流动、组织流动、技术流动、符号流动等各种“流”形成了卡斯特所定义的“流动空间”，流动空间不断产生，主导并形成了网络社会。（刘涛和杨有庆，2014：74）在电子线路和交通技术所铺设的流动轨道上，知识、商品、资本等内容在社会结构中的流动愈加频繁，人们在流动中征服了地方空间，征服了地方空间原有的状态与经验。（刘涛和杨有庆，2014：73）人们在共同体中所进行的意义交换、经验共享、文化共生不再依赖地缘和“在场”，原始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不断瓦解，“脱域（disembedding）的共同体”的概念开始重申。（张志曼等，2010：16）

原始意义不断瓦解的同时，随着社会生活进入流动的空间，共同体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被不断地重构。共同体不是既定的，而是不断协商下的一种关系。不同的群体关系、组织类别、兴趣爱好、利益划分语境下，共同体的概念脱离地域的束缚，个体在共同体中寻求满足需求的途径，进而延展出学习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行业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等。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体借由互联网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藩篱，实现从地域的缺席到虚拟“在场”，虚拟共同体成为网络社会中公民集群形成共同体的路径。虚拟共同体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个体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脱域的共同体以互联网作为信息传导方式，使共同体从实体转为虚拟形态，为个体提供血缘、地缘之外的归属感，满足个体在网络社会生存的需要。（夏迎秋，2007：8）

目前我国对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对其概念的界定也不尽相同，现有与其相关的研究中包含了“网络共同体”“虚拟社区”等相近概念。李斌（2006）认为网络共同体是“网络”“网民”和“共同体”相结合的一种全新的概念，是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一种“团体”或“组织”。夏迎秋（2008）将网络共同体界定为以信息联系为连接纽带而形成的，网民在网络上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所结成的集群形式；并从成员构成、时空领域、社会心

理、发展动力、社会约束、交往方式和连接纽带等多个维度界定了网络共同体的特征。张雨暄（2015）指出了虚拟共同体与网络共同体的差异所在：“网络共同体往往强调在‘网络’这样明确的介质中产生的来自于人类思想意识主控下的‘团结’。然而，虚拟共同体则沿用了滕尼斯对于共同体最本质的界定：共同善和协商自治。具体地说，虚拟共同体是对网络空间‘结合’的一种理性假设。‘网络共同体’中，‘网络’是共同体依托生存的介质；而‘虚拟共同体’中的‘虚拟’则是共同体存在的一种‘形式’。”在不同的语境和话语体系下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但张志曼等学者（2010：16）从共性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就是“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人的群体”。从这一共性可以看出，所有类型的共同体都包含共同目标、认同和归属感三个关键要素。

“我”是社会中的个体，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作为社会人，“我”只有处在关系之中才有意义。在互动协商中，个体的身份通过表现和交换得以显现在群体和网络之中，进而超越个人形成群体身份，以此标记群体内成员。共同体出现的前提条件，是所属成员都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对他人的信赖和安全感。（张志曼等，2010：19）共同体给予个体归属感和“内群体”的身份，被共同体排外的群体则被标记为“外群体”。“我”归属于某一群体，与人分享意义与价值，也能跨群体生存，通过跨群体身份来实现个人的价值、独特的创造和社会文化的融合。（单波，2010：11）这种在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距离的变化、跨界生存的可能性、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对立，以及开放的文化系统，正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元素。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单波，2010：33）虚拟共同体的构建跨越了地缘得益于传播技术不受地理约束，从实践意义上讲，共同体的成员面临本土文化与共同体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个体身份与集群身份的变迁，虚拟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体现出的排他特性都是跨文化交往和传播的实践行为。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其1962年出版的《传播》一书中对现代传播和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问题作出了深入的阐释。威廉斯认为，人类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某种共同文化经验，今天各种新兴的大众

传播媒介代表着共同文化经验。（曾一果，2013：12）威廉斯将传播视为经验和意图的分享，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关于传播的理论都是关于文化共同体的理论。（章辉，2014：91）

全球化背景下，人们所接受的文化信息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物理空间，传播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口流动、信息流动。跨地区的文化交流突破了空间对文化的限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特征。（单波，2010：75）因此，跨文化传播与虚拟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虚拟共同体是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跨文化传播是虚拟共同体形成及显现的路径，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最重要的意义是连接人，他们在互动中建构彼此，形成信任，逐步实现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最终形成认同后的和谐相处。

二 虚拟共同体的形成

前文已对虚拟共同体的界定做出阐释，且指出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任何类型共同体形成的三个关键要素。其中，共同目标是共同体生成的前提，身份认同是共同体生成的基础，归属感是共同体维系的纽带，接下来本书将从这三种要素分别探讨虚拟共同体的形成。

1. 共同目标

“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滕尼斯直接指出了共同体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即实现成员的共同生活目标，最终实现和谐相处的状态。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维系了成员的生存需求，精神共同体满足了情感维系的需求。共同体的目标是满足成员的共同需求和利益，如学习共同体的成员的共同目标是提升学习能力；“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强调社会是追求外部的目标，即维持既定的规则和秩序。

同样的，虚拟共同体的形成同样基于成员的共同目标。有了共同的需求和目标，个体与个体之间才会产生连接，分享经验。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虚拟共同体缺少领导力和约束力，在不受到生存需求束缚的情况下，网民的匿名性和随意缺席使得共同体对成员的约束行为很弱。现有研究发现

网络共同体的连接驱动力更多的来自于共同兴趣和爱好，“这使得他们具有极强的主动性，热衷参与共同体中的各种事物，或者从共同体获取有用的信息资源进行共享，满足他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他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是很强的。”（夏迎秋，2008：11）同样，张雨暄（2015：34）认为虚拟共同体可以划分为利益型虚拟共同体和非利益型虚拟共同体。显而易见，利益型虚拟共同体以获得利益为目标；而不被利益需求牵引的虚拟共同体往往是成员按照自己的喜好、兴趣或公益慈善来组成。

2. 身份认同

滕尼斯强调，在精神共同体中，成员之间的关系互动使得个体可以在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一个有共同言论和行动的共同体中，只有在“我们”中“我”才会变成“我”。个体并不优于团体，与其说它是种我们栖居于中的团体，不如将其定义为我们将要成为的个体的种类。

前文提到，由于组成虚拟共同体的成员更加强调兴趣和爱好，而共同体的形成取决于个体直接自愿的意志，因此成员对虚拟共同体的认同感更为自愿和强烈。但网络空间的流动性增加了跨界身份的多元化：身份有个人、社会和他群体特性，个人的身份传播是个人身份、群体身份和跨群体身份三位一体的活动。传统意义上，一个个体会归属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与生俱来，性别、年龄、职业等身份特征难以改变。而虚拟身份破除了传统身份认同的固化，人们可以凭借利益和爱好自由选择所属群体和持有相同价值观的群体，这种跨界身份随机且流动。人们可以为了同一利益组成临时的共同体，也能够因为兴趣改变而退出虚拟共同体。

3. 归属感

“共同体总是好东西。置身于共同体之中，这总是好事。……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是安全的，……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我们的责任只不过是互相帮助。”“共同体依赖这种理解……是一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是‘那些联结在一起的人恰当的、真实的意愿’；幸亏是这种理解，而且只有这种理解，在共同体中，人们‘才得以保